

俄国大动乱年代的政治机遇与选择^{*}

周厚琴

【内容提要】 16~17 世纪之交的俄国经历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动乱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如伊凡四世特辖制后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留里克王朝中断、波雅尔贵族的争权夺利以及外国的武装干涉。这些因素使大动乱年代的俄国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选举”沙皇、限制沙皇权力和出现多个地方权力中心的新现象，使俄国有了走上“等级代表君主制”的契机和可能。然而由于强大的专制传统、政治精英的软弱和社会政治意识的滞后，俄国并未真正走上等级代表君主制的道路，依然选择了重建专制，这是俄国专制君主制路径依赖的结果。

【关键词】 俄国 大动乱 等级代表君主制 专制君主制

【作者简介】 周厚琴，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博士。

17 世纪初大动乱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对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用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大动乱是两个相邻时期之间的过渡时间，“与前一时期在其原因上有联系，而在其结果上又与后一时期相联系”^①，即旧的留里克王朝中断，新的罗曼诺夫王朝开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俄国学者强调要加强对 17 世纪的研究。他们指出，在谈到 17 和 18 世纪时，人们总是“赋予两个世纪不平等历史意义，往往更重视 18 世纪”，但实际上“17 世纪才是彼得进行改革的前提”，18 世纪的很多历史进程都源于 17 世纪^②。2013 年又恰逢俄国大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项目号 11&ZD134）第一卷的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项目号 15XJC8100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承担。

^①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左少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 页。

^② Талина Г. В. Выбор пути: Рус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 –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VIII ве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мир. 2010. С. 5 – 6.

动乱结束400周年,学者们也纷纷重新思考17世纪对于俄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①。不得不说,正是大动乱使莫斯科罗斯政治发展面临重新调整和选择的机遇:是稳固和发展大动乱变局下的“等级代表君主制”新趋势^②,还是重建和强化前朝的专制君主制^③。

一 大动乱发生的历史背景

在史学研究中,与莫斯科留里克王朝末代沙皇费奥多尔1598年死后俄国发生的严重王朝危机相关的事件被称为大动乱或大动乱年代。这一用词始于当时的外交衙门书记官格里戈里·科托希欣,他于1664年逃离俄国并在瑞士写下有关俄国政治秩序和社会情况的著作,用了“大动乱年代(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或“大动乱(Смута)”来指代俄国17世纪初的历史事件^④。

学者们对大动乱的结束时间认识基本一致,即1613年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为新王朝第一位沙皇。但对大动乱的开始时间看法不一,如普拉托诺夫从1584年伊凡四世去世算起^⑤;更多学者如克柳切夫斯基、萨哈罗夫则认为从无子的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1598年死后无继承人时就显露出了动乱的征兆^⑥;西方学者梁赞诺夫斯基赞同1598年的观点^⑦,而莫林·佩里则强调大动乱是俄国的“内战”,认为应当从1603年伪德米特里对莫斯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的正

① 2013年《俄罗斯历史》杂志刊登了俄罗斯召开的几次关于大动乱的重大学术会议通讯。如2012年10月24~2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国与波兰学术会议“俄国大动乱与波兰—立陶宛王国大洪水:17世纪克服国家危机的经验”。参见 Российско-польск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мута в России и Потоп в Речи Посполитой: опыт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XVII столет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3. №5. С. 194—199.

② “等级代表君主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尤什科夫提出的概念,与西欧的等级君主制概念相似,强调国家存在由各等级选派的代表参加的等级代表机构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俄国的政治史往往将16~17世纪“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视为等级代表君主制建立的标志,但实际上在大动乱以前,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都没有真正限制过沙皇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16世纪俄国的缙绅会议不同于西欧的等级机构,只有大动乱时的俄国才出现了向真正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发展的趋势。

③ 本文将专制君主制视为俄国特有的历史现象和政治制度,是对俄语中特殊的“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一词的翻译,在于强调俄国自伊凡三世起就开始起源的专制政治传统。

④ Морозова Л. Е.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М.: АСТ; Астрель, 2011. С. 3.

⑤ Платонов С. Ф.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муты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X VI — X VII вв.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5. С. 125.

⑥ 分别参见〔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15页;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2т. Т. 1.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 // Под ред. А. Н. Сахарова. М.: АСТ; Астрель; Владимир: ВСТ, 2009. С. 424.

⑦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统地位发起挑战开始^①。笔者从政治的角度考察，赞同以王朝中断为开端，即从1598年至1613年。

研究者们对大动乱开始的原因及后果也没有达成一致。С. М. 索洛维约夫认为，大动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旧的亲兵原则与新的国家原则相冲突，它表现为莫斯科君主（鲍里斯·戈都诺夫、瓦西里·舒伊斯基）与波雅尔和哥萨克的反国家意图作斗争。Н. И. 科斯托马罗夫则将教权、波兰国王、僭位王德米特里的阴谋视为大动乱的主要原因^②。С. Ф. 普拉托诺夫认为动乱的根源在于伊凡雷帝的统治，正是伊凡四世缺乏理智的外交和内政导致了俄国社会分裂为敌对团体。他将大动乱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又包括8个小的关键环节：争夺莫斯科王位（波雅尔内讧、动乱扩至军人团体）的“王朝阶段”、破坏国家秩序（公开社会斗争的开始、国家在图希诺和莫斯科政权之间分裂、图希诺和莫斯科政府的垮台）的“社会阶段”和尝试重建国家秩序（王权专政“*королев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的建立及垮台、第一个自治政府“*зем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的建立与解体、第二个自治政府的建立及其胜利）的“民族阶段”^③。

苏联史学放弃了“大动乱”的术语，替而代之的是“反对农奴制的农民战争”的概念。17世纪初的事件开始被称为“И. И. 波洛特尼科夫领导下的第一次农民战争”。后来Р. Г. 斯科伦尼科夫重新使用“大动乱”的术语，并开始认为，这一时段发生了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俄国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卷入其中。А. Л. 斯达尼斯拉夫斯基对这一时段提出了新的术语——国民战争。他认为，它的主导力量是哥萨克。美国学者Ч. 丹尼克提出，大动乱的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拿起手中的武器开始与“温和的沙皇德米特里”作斗争。德国史学家Г. 诺利特认为，这一时期发生了俄国边疆普通民众为得到更多独立而与中央政权的斗争^④。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引起动乱的原因绝非王朝中断和僭位复辟这么简单，而是社会各阶级都依次卷入动乱^⑤，说明大动乱有其深刻的潜在原因。综合历史学家们的分析，大动乱有四个主要原因：

① Maureen Perri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 I From Early Rus' to 16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10.

② Морозова Л. Е.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С. 3.

③ Платонов С. Ф.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муты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XVI – XVII вв. С. 125 – 360.

④ Морозова Л. Е.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С. 3 – 5.

⑤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7~29页。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蔓延。俄罗斯所有社会阶层,首先是土地占有者有不满的理由。由于尤里节的废除和税赋的加大,16世纪末农民状况急剧恶化,相当部分的农民逃往国家的边区,企图藏匿于“荒野”。世袭领地和封地逐渐荒废,而在国家的南方聚集了大量不满的人。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伊凡雷帝时代。他“以自己的狂妄措施把国家搞得精疲力尽,就像一个狂热的车夫在赶精疲力尽的马”^①。其继承者不但没有找到其他手段以摆脱危机,反而令形势更为加剧,从而招致全面不满并加深了各阶层的不和。

第二个原因,如果说社会各阶层不满是“架起的火堆”,那么王朝危机就是“点燃火堆的火花”。无子的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在1598年1月寿终正寝成为骚乱的开端。这时既没有留下费奥多尔的在世兄弟(11岁的王子德米特里还在1591年便死去或可能是被害),也没有留下伊凡·卡利达旁系后裔的任何一个代表,留里克王朝中断。此前,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天生的君主”是没有怨言而绝对服从的,但当王朝中止和国家成为“无主”状态的时候,全国上下就不知所措而动荡起来。在复杂的形势下通过缙绅会议选举产生新君主成为合法途径。在牧首约夫的主导下,鲍里斯·戈都诺夫成为第一个“选出来的沙皇”(1598年)。鲍里斯深知自己的地位不稳,所以谨慎行事。他寄希望于习惯的力量迟早会让人民和显贵把他及其后代视作“真正的沙皇”。

但第三个原因随之立刻起了作用,因特辖制而在经济上削弱、道德上受辱的莫斯科最高阶层波雅尔贵族,展开了混乱的夺权斗争,竭力不惜任何代价要把自己的傀儡推上王位。憎恨鲍里斯的波雅尔利用他缺乏沙皇族系出身的致命要害,开始支持与鲍里斯对抗的僭位者(самозванец)。大胆的冒险家格里戈里·奥特列皮耶夫,宣称自己是意外得救的、长期藏匿的伊凡雷帝的小儿子德米特里,1605年他成功成为“合法的”、“天生的”君主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沙皇,史称“伪德米特里一世”。但他很快被杀,其成在波雅尔,败也在波雅尔。策划对僭位者阴谋的头目瓦西里·舒伊斯基曾公然宣称:他之所以承认伪德米特里为沙皇只是为了摆脱戈都诺夫^②。随后他自己成功变成了“波雅尔沙皇”。不过,相比而言,波雅尔沙皇在社会各阶层眼中更加缺乏继位合法性,他的继位引起了更多阶层加入动乱。

^①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 // Под ред. Б. Н. Флор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С. 234.

^②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6页。

第四个原因便是王位争夺导致的外国干涉。为来自立陶宛的“德米特里王子”提供军事政治和财政援助的正是波兰大地主和罗马天主教会。显然，第三个和第四个原因是紧密相连的。用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僭位者“只是在波兰的炉子里烤熟，而发酵则是在莫斯科”^①。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隐蔽的干涉在伪德米特里二世出现后就变为直接的干涉。直接干涉的顶峰即波兰国王西吉蒙德三世违背让其儿子弗拉基斯拉夫改宗东正教并就任莫斯科沙皇之约，打算自己占据莫斯科王位。自此，大动乱开始变成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解放运动。

总体上看，大动乱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俄罗斯的社会结构还不稳定，不成熟，国家集权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在一些地区，俄罗斯的管理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差别。客观地说，上述原因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过去，历史学家们要么强调外国干涉的作用，要么强调社会矛盾的因素。特别是苏联史学界基于阶级斗争理论形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大动乱是一场浩大的“农民战争”，其顶峰就是伊凡·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波克罗夫斯基甚至称之为“农民革命”^②。这样的观点显然过于片面，大动乱远比农民战争要复杂得多。与其说它是一场“农民革命”，不如说是莫斯科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面动荡。首先，它的直接和最严重的后果是国家陷入可怕的破产境地。其次，在社会结构上旧的世袭波雅尔贵族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削弱，他们要么在动乱中死亡或破产，要么由于自己的阴谋、摇摆不定以及与国家敌人结盟而使自己的道德地位下降并自毁声誉。最后，在政治关系上，当聚集的国民力量恢复被毁坏的国家时，他们表明莫斯科国家并不是自己“主人”——君主的“世袭领地”和创造物，而是“整个大罗斯王国所有城市 and 所有公职人员的共同事业和共同创造物”^③。

大动乱的历史更像是一种“钟表式运动”。最初是“倾斜”，破坏性过程不可抑制地增长，国家的所有阶层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到大动乱之中。但是，在走过下面的最低点后，钟表进入上升期。社会逐渐团结、克服混乱，国家开始恢复的过程^④。大动乱沉重打击了统治阶层的财产关系和私有权，商人破产了，地主的农民跑散了。统治阶层的总体私利要求恢复国家和重建秩序。为了恢复秩序，社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3页。

② [苏]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贝璋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8～90页。

③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 Наука, 1991. С. 165 – 166.

④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 // Под ред. Б. Н. Флори. С. 236.

会开始成熟。继第一支民军（1611）失败后，1612年秋，第二支民军（1611～1612）胜利地从外国人手中解放了莫斯科。1613年2月缙绅会议选举了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成为新沙皇。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大动乱的结束。克服大动乱的严重后果还耗费了很多年，它在社会政治关系上所引起的变化影响到俄罗斯以后的发展。

二 大动乱年代的新政治机遇

传统的教科书中通常认为，17世纪初俄国在大动乱危机中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国家在外国军事干涉下失去主权而覆亡，要么重建原有的国家机制（几乎不受限制的君主制）并摆脱外国干涉。学术界的认识则大有不同，研究者们在动乱中发现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新机遇和可能性。的确，大动乱时期俄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一）最高政权合法性的新来源：选举沙皇

纵观俄国历史，基辅罗斯最高权力继承的传统是，大公之位由家族中的长者继承，即兄终弟及的横向继承与父死子继的纵向继承相结合，且横向继承优先。14～15世纪莫斯科公国通过遗嘱方式强化了父死子继的传统。15世纪末至16世纪，随着莫斯科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建立，最高政权的传承基本延续父死子继的传统，但同时专制君主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开始强调个人独裁的意志。伊凡三世早就宣称过：“难道朕，我大公对自己的子孙和公国不能做主吗？朕想给谁，就把公国交给谁统治”^①。伊凡四世更是反对波兰—立陶宛的选举国王，强调沙皇是“按上帝的意旨”，而非“按芸芸众生的愿望”登基的，因此他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行事：可以拒绝它（他三次退位），也可以将它转交给他人（如1574年他将鞑靼人卡西莫夫汗萨英—布拉特加冕为“全罗斯大公君主”）^②。也就是说，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帝拣选”和“王位父子继承”的原则。

大动乱首先开启了另一种产生沙皇政权的方式——“选举”沙皇。1598年1月，在无子的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死去后，莫斯科宣誓效忠他的寡妻、皇

① [苏] B. B. 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5页。

② Данилов А. Г. Новые явл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муты.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13, No. 11. С. 78 – 79.

后伊琳娜，但伊琳娜拒绝登位并出家当了修女。莫斯科突然陷入没有沙皇的境地。这时牧首约夫极力推荐并坚持使人们接受执政者鲍里斯·戈都诺夫为皇位候选人，但鲍里斯一直拒绝，表示他从没有登上沙皇皇位的想法。于是莫斯科国家召开所有城市官员代表的缙绅会议，会议一致推选鲍里斯·戈都诺夫为沙皇，宣称他是应“俄罗斯国家全国神圣的会议、波雅尔、虔信基督的军队和全体东正教会”的要求并经选举而登上沙皇皇位的^①。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选举”更像推选、拥立。

后来，瓦西里·舒伊斯基也以相似的方式登上了沙皇之位。当时的文告说，1606年在推翻伪德米特里一世后，宗教会议、波雅尔和所有人选出了瓦西里·舒伊斯基为全罗斯的专制君主，但实际上并未进行所谓的选举。瓦西里害怕各城市、各省派来的候选人，于是他自作主张，不召开缙绅会议。对他的所谓“选举”是这样进行的：有爵位的波雅尔集团中少数拥护他的人在圈子内承认他为沙皇，然后一大群被他发动起来反对僭位王和波兰人的忠于他的莫斯科人，在红场上大肆吹捧他^②。用索洛维约夫的话说，他“不是选举出的，而是被喊成了沙皇”，或者用同时代人的话说，“那些不知羞耻的波雅尔官员自行把他送上沙皇之位”^③。

比较符合选举意义的一次是1613年选举米哈伊尔为沙皇。第二支民军顺利解放莫斯科后，全国贵族民军和哥萨克民军的首领——波扎尔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组成临时政府，号召在莫斯科召开从所有城市 and 所有公职人员中选举代表的“全国会议和国君选举”。1613年1月和2月举行缙绅会议，参会代表的组成是莫斯科历届缙绅会议中最广泛的，包括了居民中的所有阶层（除了奴隶和地主的依附农）。会议比较容易地达成了以下协议：“不得选立陶宛和瑞典的国王和他们的子弟，以及其他任何异教的、非希腊规矩的基督教信仰国家的人登上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国家王位，也不得选玛琳娜和她的儿子（即伪德米特里二世的妻儿）登位”^④。会议决定在“自己人”中选一个，但立刻就开始了分歧、争论、阴谋和混乱，因为在莫斯科大波雅尔家族中的人，先前不是与波兰人结盟，就是与图希诺贼结盟，都不是名副其实的、受欢迎的候选人。经过长久的争论后，1613年2月7日选举人同意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候选人，他是受难的、

①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152.

②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7～38页。

③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155.

④ Там же. С. 162.

被波兰俘虏的大主教菲拉列特的儿子。会议秘密派出忠实和严守教规的人探访所有人关于国君选举的想法,这种秘密警察式的调查,很可能还带有宣传鼓动,这对会议来说,仿佛成了“一次投赞成票的全民表决”^①。于是,缙绅会议在 1613 年 2 月 21 日一致选举并隆重宣布米哈伊尔为沙皇。选举文告说,“全莫斯科国家的所有东正教徒”希望他当沙皇,同时又强调他与前朝沙皇的亲属关系:新沙皇是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侄子^②。

17 世纪初的“选举”沙皇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意味着,除了“上帝拣选”和“王位父子继承”外,俄国还出现了另一种产生沙皇政权的方式:“民选”(“由所有等级的人们选举”)。这种方式反映了 17 世纪人民与君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不仅具有宗教性,而且具有世俗性,意味着把对沙皇效忠不仅看作基督徒的义务,而且是对沙皇本身甚至是对国家的义务^③。大动乱向人们演示了政权与人民之间关系的不可分割性:没有人民的支持,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难以经受危机的考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民同样也常常寻求保卫者和来自国家的庇护,对于人民来说国家的人格化就是君主。在所有的起义中人民从来不反对沙皇:起义者反对波雅尔、官员、地主,但不反对君主。僭位王这一现象本身证明的,首先不是降低沙皇政权的权威,而是提高它的权威。在僭位者声称有权登上王位时,人民群众看到的是真正的“好”沙皇,是黎民百姓的保卫者。在危急的情势下人民直接向沙皇提出自己的请求。1605 年伪德米特里一世(1605 ~ 1606 年)就曾亲自接见呈文者。沙皇与平民“击手”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在人民意识中存在着政权与人民之间具有不可分割联系这一明确观念^④。科布林则赋予其更高层次的意义,认为“选举君主——这是君主与臣民之间达成的协议,这意味着向法制国家迈进了一步”^⑤。克柳切夫斯基认为 1613 年的选举是“真正人民代表制的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经验”^⑥。

“选举”沙皇也使具有等级代表意义的全国会议(即缙绅会议)的职能扩展到顶峰。新沙皇须在形式上或实际上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在此后的沙皇即位中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第 70 页。

②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163.

③ Лисейцев Д. В., Рогожин Н. М.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смуты—время выбора.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8, No. 5, С. 39–50.

④ Там же. С. 39–50.

⑤ Кобрин В. Б.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 утра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люди, идеи, решения.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IX — начала XX вв.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 178.

⑥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第 96 页。

成了例行的规则。“全国会议有权决定谁当、谁不当沙皇；没有全国代表，沙皇不能决定任何问题”的新观念随着大动乱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中^①。先前很少为人所知的用语，如全国会议（совет вся земли）、全国缙绅会议（общий земский совет）、全民大会（всенар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成了表达支配社会意识的新概念的流行语。这些概念将“全国会议”选举君主的思想深深铭刻在社会意识中^②。1609年，造反的梁赞贵族松布洛夫在莫斯科广场上召集了一群人，要求波雅尔推翻瓦西里。但在人群中却有人驳斥道：“虽然沙皇不合你们的心意，但是没有波雅尔大贵族和全民会议的决定，就不能把他从王位上赶下来”。以波雅尔为首的“全民会议”似乎被认为是唯一的解决此类重大问题的全权机构。这一看法也不仅仅只是人民的想法，沙皇瓦西里本人也如此认为。当松布洛夫们冲进王宫，沙皇瓦西里这样说道：“你们这些违背誓约的人，为什么这样嚷嚷和无礼地来到我这里？如果你们要杀死我，那我准备去死；如果你们要把我赶下王位，在全体波雅尔和各级官吏没有集会之前你们是办不到的。不论全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准备按决定行事。”也就是说，全民缙绅会议“不仅有权选举沙皇，而且有时还有权审判沙皇”^③。自此，缙绅会议获得了真正的最高权力。

（二）限制沙皇专制权力的尝试

限制沙皇权力的新政治概念，正是产生于大动乱时期。由于王朝的中断，人们意识到，对于从本国人或外国人中选出的沙皇来说，国家不可能再是他的世袭领地了。这时的波雅尔在经受了伊凡雷帝和戈都诺夫时期的政治刺激后，参与国家管理的热情高涨起来，试图建立一种以同沙皇签订书面条约，即正式限制最高权力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大动乱期间，这样的尝试进行了四次。

第一次尝试是1598年选举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时。在伊凡雷帝统治下饱经忧患的波雅尔现在从自己的同伙中推举出一位沙皇来统治，他们就不愿再安于旧王朝时那种传统的政治作用了，而是期待用一种正式文件来限制沙皇的权力，想“让他按照规定的文告向全国吻十字架宣誓”。戈都诺夫则以拒绝接受沙皇地位的迂回战术逃避这种权力的限制。戈都诺夫最终还是在无条件限制的情况下登上了王位。也就是说，第一次对沙皇权力限制的尝试尚未出台就流产了。鲍里斯

^① Данилов А. Г. Новые явл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муты. С. 81.

^②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95页；同时参见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 Полны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Т. 2. М. 2002. С. 246.

^③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78页。

上任后，察觉到波雅尔的暗中不满，于是组织了一个复杂的秘密警察监视网，那些告发自己主人的波雅尔家的奴仆和从牢狱中放出来的小偷在监视中发挥了作用。随着告密而来的是罢官贬职、刑讯拷问、判处死刑、籍没家产。这个由缙绅会议选出来的沙皇像伊凡四世一样喜欢专制独裁，“变成了一个心眼狭小的靠警察统治的懦夫”^①。普拉托诺夫认为此事反映出“聪明的鲍里斯比波雅尔更加深谋远虑”^②。但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鲍里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③。这种情况下，波雅尔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反对他，最后他还是被波雅尔支持的僭位者取代。

第二次尝试是1606年5月瓦西里·舒伊斯基登上王位时的“宣誓文告（Подкрестная запись）”。舒伊斯基在文告中向全体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立下誓约：“通过真正的、正义的法庭”，按照法律，而非擅自审判他们；“朕决不听取诬告，而是坚决用各种侦讯手段侦查罪证并当面对质”，对诬告应视为对被告者强加的罪责惩处；沙皇“不得无故贬黜其臣属”^④。然而这种文告是非常片面的。根据文告，舒伊斯基要承担的全部责任，仅在于使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来自沙皇的肆虐迫害。但是他承担的责任不直接触及国家制度的基础，甚至既不改变也不明确规定沙皇和最高执政机关的作用、权限和相互关系。沙皇的权力受波雅尔杜马的限制，但这一限制只在审判案件中对个别人时才对沙皇有约束力。这一文告更像是波雅尔与沙皇密谋的结果，波雅尔在确保消除沙皇的“专横暴虐”后就确信今后国家的执政大权仍然会在自己手中。虽然这一文告不够完善，但克柳切夫斯基仍然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这是在正式限制最高权力基础上建立国家制度的最初尝试”。瓦西里不仅在文告中限制自己的权力，还用吻十字架宣誓来确认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誓言在实质上否定了过去王朝的沙皇所拥有的权力。与此同时，瓦西里放弃了沙皇个人权力中最明显的三大特权：“无罪贬谪”、没收未参与罪行的罪犯家属和家属财产（即放弃政治株连的旧制）、警察特别侦讯审判。这三大权力是君主肆意妄为、独裁专制权力的主要内容。沙皇信誓旦旦地放弃这些特权，使自己“从一个奴仆的君主变成了依法治理臣民的合法沙皇”^⑤。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3页。

② Платонов С. Ф.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 1. М. 1994. С. 258.

③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1页。

④ 同上，第38~39页。

⑤ 同上，第41~42页。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舒伊斯基的统治是俄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时代，他在登基时限制了自己的权力，并在颁发到各地的即位宣誓文告中正式阐明了这种限制^①。切列普宁指出，舒伊斯基 1606 年的“宣誓文告”拒绝了伊凡四世在 1564 年特辖制之初享有的那些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最高政权与各等级关系的一大进步，远离雷帝专制统治的思想和实践^②。科布林则将这一文告视为“沙皇与其臣民的第一个协议；是向封建的法制国家迈出的微弱的、迟疑不决的第一步”^③。不过，史学家们对舒伊斯基的“宣誓文告”仍存有不同的看法：他究竟是限制自己的权力呢，或者这只是如普拉托诺夫所说的“庄重宣言”；它限制的只是司法权力呢，或者还包括政治权力？笔者以为，这些争论的问题不在于舒伊斯基的目的，也不在于这一文告本身具体条款限制性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在人们意识中产生的影响，它某种程度上在人民中宣传了沙皇权力受限的新思想。

第三次尝试是与波兰国王西吉蒙德三世关于承认弗拉基斯拉夫登上莫斯科王位所签订的两个条约（1610 年 2 月 4 日条约和 8 月 17 日条约）。1610 年 2 月 4 日条约是萨尔蒂科夫代表团^④与波兰的西吉蒙德国王在斯摩棱斯克城签订的，阐明了图希诺全权代表承认弗拉基斯拉夫王子为莫斯科沙皇的条件：不仅保持莫斯科国家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增加他们不曾享受过的新的权利和自由^⑤。这是一个相当详尽的国家组织结构的计划，在俄国政治史中具有其重要意义。第一，文件表述了莫斯科全体人民和某些阶层的权利和特权。比如，条约首先保证俄罗斯东正教不受干预，保障臣民人身自由不受当局任意侵犯的权利。所有人都应依法审判，任何人不经审判不受惩处。继续强调政治犯的无辜兄弟、妻子儿女不为他的罪行受株连，他们的财产也不被没收。更令人惊讶的还有两条新规定：官职高者无罪不得贬谪，官职低者有功应得提升；莫斯科国家的每个人可以自由去其他基督教国家求学和从事研究，君主不得因此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规定波兰国王和王子不得强使人从信希腊正教改宗罗马天主教和其他任何教。条约还规定了神职人员、杜马官员、衙门官吏、京城和各城市的服役贵族、波雅尔子弟及部分商贾的权利和特权，并可根据功劳扩大这些权利和特权。但不准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第 38 页。

② Черепнин Л. В. Земские соборы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VI – XVII вв. М. : 1978. С. 156.

③ Кобрин В. Б.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 утра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 177.

④ 1609 年秋，伪德米特里二世放弃图希诺逃亡卢卡加，留在图希诺的波雅尔米·格·萨尔蒂科夫、几个当京官的贵族和六个莫斯科衙门秘书官就组成代表团，准备同意接受弗拉基斯拉夫王子为沙皇。

⑤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第 44 页。

“庄稼人”在土地占有者之间转来转去，奴仆对主人仍然处于从前的依附地位。第二，文件规定了最高管理制度。君主同两个机构——缙绅会议和波雅尔杜马一起分享自己的权力（2月4日条约中称之“波雅尔和全国的杜马”）。条约首次区分了这两个机构的政治权限。缙绅会议被赋予了立法的权威——“波雅尔和全国”负责修改和补充审判惯例和莫斯科法典，由君主认可。缙绅会议还拥有立法倡议权。波雅尔杜马则拥有立法权：君主同它一起进行日常的立法工作，颁布一般的法规。不经杜马同意，君主不得在过去历代君主规定的捐税以外增加新的赋税和作出改变。杜马还拥有最高审判权：未经侦讯和全体波雅尔参与审判，君主不得惩办任何人。最后条约还重申，所有这些事项，君主应根据波雅尔和杜马成员的决定结合建议加以处理，不经杜马同意和波雅尔决定，君主不得擅自处理^①。1610年8月17日条约则是当沙皇瓦西里被利亚普诺夫为首的服役贵族推翻、剃度为僧后，由“王公 Ф. И.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伙”的波雅尔杜马执掌的“七领主政府（семибоярщина）”与波军统帅若尔凯夫斯基达成的协议^②。但8月17日的条约并非2月4日条约的简单翻版，而是做了有意思的增减。比如，豪门大贵族删去了按功提升非名门出身者的条款，删去了莫斯科人有权到别的基督教国家学习的条款。

学者切列普宁认为上述条约是“反爱国主义、反人民的”^③。其他学者则不赞成这一看法。克柳切夫斯基认为，2月4日条约是“一个完整的立宪君主制的基本法律。它既规定最高当局的结构体制，又规定臣民的基本权利”^④。齐切林在《人民代表制》（1899年）中指出，2月4日条约“包含了对沙皇权力的重要限制，如果它得以实施，那俄国将是另一种样子”^⑤。科布林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⑥。笔者以为，在大动乱的情况下，俄国人决定邀请外国人当俄国沙皇是在确保俄国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并非在侵略者面前投降。也就是说，这一限制最高权力的条约在俄国政治史中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四次尝试是1613年2月选举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时的“限制文书”或“书面誓约”。米哈伊尔究竟有没有签署这样一个受限制的“书面誓约”，虽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44~46页。

②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Наука. 1991. С. 158.

③ Черепнин Л. В. Земские соборы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VI – XVII вв. С. 159.

④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48页。

⑤ Янов А. Л. Россия: У истоков трагедии. М. : 2001. С. 29.

⑥ Кобрин В. Б.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 утра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 180 – 181.

然并未留下来史料，但从同时代人的一些说法能看出来这一誓约的存在。米哈伊尔的父亲菲拉列特大主教获悉在莫斯科召开选举会议后，从波兰囚禁地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恢复过去那些沙皇的权力意味着使祖国遭到彻底毁灭的危险，他宁愿死在波兰人的监牢里也不愿自由地成为这种不幸的见证人。一个普斯科夫人写了一部关于动乱时期和米哈伊尔朝代的纪事，也提到：在米哈伊尔登位时，波雅尔强迫沙皇吻十字架宣誓——不得因任何罪行处死达官贵人和大贵族家的任何人。晚一辈的外交事务衙门书吏格里戈里·科托希欣提到米哈伊尔时也说：虽然他署名时自称专制君主，但不经波雅尔杜马同意他什么事也干不成^①。经克柳切夫斯基考证，沙皇米哈伊尔即位时应该交出了这样一份书面誓约：遵守和保持东正教的信仰；忘记过去那些家族的旧仇宿怨；不得擅自颁布新法律，也不得擅自改变旧法律；不得擅自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要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重大诉讼案件；最后，要把自己家族的世袭领地交给亲属或并入王室领地。不过，这种限制更像一场政治交易，这种交易的首要目的在于“保证波雅尔大贵族的人身安全，不受沙皇专横暴戾之害”。它不便于在缙绅会议面前把这样一个“极端派别性的文件”公布，所以用秘密限制权力的方式，同时并不妨碍米哈伊尔保持专制君主的尊号^②。因此，新沙皇的权力含有两个平行的语义双关的意思：从渊源上说，它既是继承的，又是选举的；从结构上说，它既是有限制的，又是专制的^③。

如上所述，限制专制君主权力的思想，将部分权力转交给以缙绅会议和波雅尔杜马为代表的社会，这些都在大动乱的国家管理方案中有所体现。

（三）地方权力中心的出现

17 世纪初俄国国家生活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国家同时存在 2 ~ 3 个政治权力中心。

众所周知，1565 ~ 1572 年伊凡四世实施特辖制时就曾将国家一分为二，特辖区和普通区。沙皇自己管理特辖区，普通区的管理交由波雅尔杜马，甚至加冕鞑靼人沙皇坐镇普通区，使国家管理看似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不过，这种“两个中心”的局面只是形式上的，因为普通区的管理并未脱离伊凡四世的控制。而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第 85 ~ 86 页。

② 同上，第 86 ~ 88 页。

③ 同上，第 90 页。

17 世纪初的情形则大为不同。

1606 年瓦西里登上沙皇之位时,谢韦尔斯克地区和以普季夫利、图拉和梁赞为首的奥卡河以南的城市都纷纷起义反对他。起义者被沙皇军队打败后藏于图拉城。1608 年夏,伪德米特里二世在波兰—立陶宛军队和哥萨克部队的支持下驻扎到莫斯科郊外的图希诺村,他被称为“图希诺贼”或“土皇帝(царик)”,并在此建立“沙皇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官邸。在伪德米特里二世治下的图希诺,波雅尔杜马、皇帝宫廷、衙门、大宫廷、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应有尽有。并且,在罗斯第一次存在两个牧首。1606~1611 年在莫斯科任牧首的是格尔莫根,1608 年秋在图希诺任牧首的是罗斯托夫的都主教菲拉列特(即后来新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的父亲)。同时,不少从莫斯科来的王公和波雅尔也投奔到图希诺阵营,尽管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向一位公然的骗子和僭位王宣誓和服务(他们在两个沙皇之间来回投奔并领取奖赏,有时反复数次,因此他们被称为“图希诺候鸟”)。很快,随着沃洛格达向图希诺政权宣誓,图希诺政权在这里掌控了几乎整个北方的赋税、经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沿海贸易商品和来自西伯利亚的莫斯科公产^①。如此对待图希诺政权的不只是少部分人,而是莫斯科社会的大部分人^②。这意味着舒伊斯基政府面临财政上的自动破产。而且,真正承认莫斯科政权的只有中央的一些县、梁赞边区的部分大的要塞、诺夫哥罗德地区、斯摩棱斯克及周围和北方部分地区。也就是说,从 1608 年秋开始,俄国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种两个政治中心对立的情形一直持续到 1610 年。

随着瑞典、波兰外来势力的介入,1609 年 9 月波兰国王西吉蒙德三世率大军包围斯摩棱斯克,而 1609 年秋伪德米特里二世放弃图希诺并逃往卡卢加,再加上舒伊斯基政府所在的莫斯科,这样又形成了三个政治中心。不久,到 1610 年 7 月舒伊斯基被推翻和 1610 年 12 月伪德米特里二世被杀,国家就陷入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③。不过,学者普什卡廖夫倒认为这恰是大动乱的转折点。因为“现在服役人员、全国上下各阶层人士以及那些还保有民族意识和宗教感情的哥萨克,只剩下一个敌人,这就是占据俄罗斯首都的外国军队,正是他们威胁着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安危和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④

① Данилов А. Г. Новые явл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муты. С. 92.

② Платонов С. Ф.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295.

③ Данилов А. Г. Новые явл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муты. С. 93.

④ Пушки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159.

这样的情形下，已脱离君士坦丁堡牧首控制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挺身而出，牧首格尔莫根在莫斯科宣布俄国人民不再效忠波兰王子弗拉基斯拉夫，并倡议各城市组织军队来解放首都。1611年3月组成了第一支民军。莫斯科的民军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服役贵族和波雅尔子弟，以当时著名的梁赞统领 П. П. 利亚普诺夫为首，第二部分是哥萨克，为首的是先前图希诺阵营的波雅尔王公 Д. Т. 特鲁别茨科伊和哥萨克统领 И. М. 扎鲁茨基。他们经过多次意见分歧和争吵后，于1611年6月30日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全国协议（Приговор вся земли）”。文件确定了国家制度和政治秩序。“协议”规定了中央集权机关的结构，像莫斯科过去那样，建立吏部衙门、服役领地衙门、刑部衙门及其他权力机构^①。切列普宁把6月30日的这次“全国会议（совет вся земли）”也划为缙绅会议之列^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缙绅会议原则上是在沙皇的召集下召开的，而这一次会议召开时，俄国根本没有在位的沙皇。不过，协议并未消除民军内部矛盾，7月 П. П. 利亚普诺夫被杀，第一支民军宣告失败。

很快，在外省城市重新开始组织新的民军的运动并向莫斯科进军。第二支民军的发起地和中心是下诺夫哥罗德，为首的是当地著名的地方长老 К. 米宁。由各阶层居民代表组成的城市会议领导了最初的行动——征集财产和召集军人。民军的指挥官是“御前侍膳和军政长官” Д. М. 波扎尔斯基王公，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军事长官，也是一位有着极高声望的人。民军的经济和财政事务则由“选出的人” К. 米宁亲自掌管^③。1612年3月末，民军已到达雅罗斯拉夫尔。在此组建了新的“全国会议”。按切列普宁的看法，从这时起，“会议”具有了全国最高政府机构的性质。因为雅罗斯拉夫尔“全国会议”的参加者十分广泛：御前侍膳和军政长官 Д. М. 波扎尔斯基、“选出的人” К. 米宁、罗斯托夫都主教基里尔，还有一些杜马官员、御前侍膳、宫廷侍臣、莫斯科服役贵族、秘书官等^④。

这样，第一支民军和第二支民军实际上成了独特的权力中心，可以说他们组建了当时俄国的“临时政府”和武装部队。民军内部还有一个由各地区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具有某种“流动的缙绅会议的性质”^⑤。正是他们的活动为莫斯

① Данилов А. Г. Новые явл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муты. С. 93.

② Черепнин Л. В. Земские соборы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VI – XVII вв. С. 173 – 179.

③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162.

④ Черепнин Л. В. Земские соборы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VI – XVII вв. С. 179 – 186.

⑤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156页。

科的解放和 1613 年缙绅会议选举沙皇准备了条件。

可见，中央政权的羸弱激起了各个阶层和居民团体的活动。如，1604 ~ 1605 年伪德米特里一世的俄国人圈子，1608 ~ 1610 年图希诺阵营的俄国人领导圈子，1610 ~ 1611 年姆斯基斯拉夫为首的“七领主政府”，1611 ~ 1613 年第一支和第二支民军的领导层，1606 ~ 1607 年起义的波洛特尼科夫及其战友，以及大动乱中那些不承认中央政权而逐渐被迫每天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军事、日常生活等方面大大小小问题的地区居民。这种情况不同于过去和未来的任何时候，在客观上“培养了成百上千的人们和数十个地区表现出特有的首创精神”^①，这在由外省承担起国家命运的义务而组建的第二支民军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

总之，16 世纪末—17 世纪初关于产生最高政权的选举原则的思想观念不仅在俄国上层，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得到了传播。这些思想在缙绅会议 1598 年推选戈都诺夫和 1613 年选举米哈伊尔为沙皇、第一支民军和第二支民军组建“全国会议”中得到践行。大动乱的这 15 年里，人们看到的政权不仅来源于首都，也来自外省。波雅尔和服役贵族通过限制沙皇权力、广泛参加缙绅会议和波雅尔杜马的国家管理来避免君主的肆意妄为。这些思想在 1606 年舒伊斯基的“宣誓文告”和同意弗拉基斯拉夫王子登上莫斯科王位的 1610 年 2 月 4 日和 8 月 17 日条约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缙绅会议选举沙皇、波雅尔限制沙皇权力、地方民军组建临时政府，这些都表明，大动乱中的俄国有一种向真正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发展的政治趋势。

三 17 世纪初俄国的政治选择

综观整个大动乱年代，从这些新出现的政治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17 世纪初的俄国，并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面临着两种抉择，而应该是三种发展的可能：一是国家覆灭，在外国入侵下失去主权；二是重建原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君主制并摆脱外国干涉；三是形成等级代表君主制：选举沙皇并立法限制他的权力，显贵投身国家管理，并在实践中运用民主机构（缙绅会议、波雅尔杜马、地方自治），发挥哪怕是部分社会的首创精神——这些都会促使国家生活中许多大问题得到解决，当然也包括战胜入侵者^②。教科书往往从传统的观念出发认为只有前

^① Данилов А. Г. Новые явл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муты. С. 94.

^② Там же. С. 94.

两种发展的可能。与其说16世纪俄国就建立了“等级代表君主制”，不如说大动乱为“等级代表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创造了尝试的机会。这第三种选择性的存在充分说明了，1613年未在法律上巩固“必须选举沙皇和限制沙皇权力”这一原则就将米哈伊尔送上王位，这并非历史发展可能方案中最佳的一个。

然而，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调整机遇与最终选择之间的背离。国家发展面临的新机遇能否把握住，关键还在于政治精英和社会意识的水平是否真正接受这些新观念。

首先，俄国政治精英在大动乱中对限制沙皇权力的观念并非坚决和义无反顾。克柳切夫斯基就指出，1613年的缙绅会议上，在混乱和纷扰中一种旧的习以为常的关于“真命”沙皇的思想占了上风，会议出席人所代表的人民智慧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宁肯复古，回到从前那种“整个社会极端沉默”的状态——这是倒退的标志^①。事实上，限制沙皇权力的思想并没有引起同时代人、包括波雅尔的欣喜。动乱时期的《新编年史》的作者对舒伊斯基的宣誓明确表示厌恶：“他（舒伊斯基）开始在教会会议上说，这事在莫斯科国家自古以来还没有：我向全国宣誓，没有会议的同意我不对任何人做任何恶事……波雅尔和所有的人对他说，希望他不要宣誓，因为在莫斯科国家不兴这个。他到底还是谁的也不听并不对大家宣誓。”^②在大动乱的中央政权极其羸弱情况下，贵族对于中央政权而言本质上只是国家的特殊“胶水”，而不是离心倾向的代表者^③。服役人员与城市精英也始终感觉自己也是中央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外省地方长老K. 米宁，还有他的战友Д. 波扎尔斯基，都是大动乱时期这种意识代表者的出色典范，使他们能够在那个时代的事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④。波雅尔限制沙皇权力的尝试往往不是公开表明的，而更像政治阴谋式的行动。他们总是幻想“按惯例和习俗”那样与沙皇一道参与国家管理，而不重视把这些落实到法律文本上。他们在怯弱地经历过雷帝和戈都诺夫的暴行后，更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而较少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他们心目中，“专制君主”与“暴君”是不一样的，他们对沙皇权力的限制更像是善良的“专制君主”的期盼。然而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俄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77～78页。

② Лисейцев Д. В. Рогожин Н. М.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смуты – время выбора. С. 41 – 42.

③ Гольдфранк Д. Парадоксы Московии XVII века. // Родина. 2006. No. 11.

④ Зуляр. Ю. А. Генезис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и дискуссия о е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вариант. Иркутск: Иркут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6. С. 85.

国政治精英在自我意识上不同于西欧，甚至不同于王权最强的法国。参加缙绅会议的，是莫斯科君主的“奴隶”，而在三级会议上发言的，则是法国国王的“臣民”。这里很好地阐释了博丹关于奴隶和臣民差别的见解：奴隶只有在其主人的同意下才能支配其财产，而臣民则仍然是他所领有的一切的最高所有者，不经他们的同意，国王是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善良主人的奴隶也还是奴隶”^①。

其次，从动乱时期的许多例证也可以发现，“选举”沙皇这一标新立异的事件事实上并未真正地民众所接受。对民众来说，一个“选出来的沙皇”就好比“选举一个父亲”一样荒谬^②。人们并不认为缙绅会议选举沙皇是证明新的国家政权合法的充分证据。当缙绅会议推选鲍里斯·戈都诺夫时就有人提出异议：“让我们同这些选举沙皇的人分道扬镳吧，因为沙皇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安排的”。缙绅会议则把这样说的人称为没有理性的人，该受诅咒的人。1611 年一份流传很广的抨击性小册子写道：上帝会亲自指定人来主宰俄罗斯国家；如果有人按自己的意志选出沙皇，那么“这个沙皇的日子就不长了”^③。可见，人们仍然认为，选出来的沙皇不是沙皇，只有出身卡利达家族的后裔，天生的、世袭的君主才是真正合法的沙皇。于是大动乱中走马灯一样上任的沙皇，无论是鲍里斯·戈都诺夫、瓦西里·舒伊斯基，还是波兰王子弗拉基斯拉夫，都不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沙皇，反而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自称是奇迹复活的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使僭位者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得逞。为什么大动乱的俄国反复出现“僭位王”？就是因为社会政治意识的“极端不发达”。即使在动乱结束的最后时刻，米哈伊尔成功登上王位，与其说因为他是全国民选的沙皇，不如说因为他是前朝最后一个沙皇的表侄^④。人们对把选举沙皇作为最高权力充分合法性的源泉这一行动充满怀疑，这种怀疑源于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世袭继承制和君权神授的观念。正是这种固化的社会意识使大动乱中出现的新政治现象难以在后来 17 世纪的发展中制度化地继续存在。斯拉夫派代表人物 K. C. 阿克萨科夫极力以 17 世纪初的历史事件来阐释俄罗斯人民的“非国家性”。他指出，在当时俄国外交困情况下，是人民拯救了俄国，当人民把波兰人赶走之后，他们能够掌握国家政

① [俄] 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 1 卷），孙静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12 页。

②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 // Под ред. Б. Н. Флори. С. 234 – 235.

③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第 58 页。

④ 同上，第 72 ~ 73 页。

权，并且建立任何形式的统治机构。但是危机解除后，人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沙皇，重新恢复专制君主制。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弄权，自愿把政权送给沙皇。斯拉夫派正是以此来证明“专制制度与俄罗斯人民、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现在和将来密不可分，专制制度的统治形式是俄国固有的”^①。

再次，动乱时期俄国社会意识中“好沙皇”的观念依然牢固。波兰小贵族萨穆伊尔·马斯克维奇在关于俄国的札记（写于1611年）中生动地写道：“我们的人在同俄国佬谈话时赞扬自己的自由，劝他们同波兰人民联合起来，也取得自由。但俄国人答道：你们珍重你们的自由，我们却珍重我们的不自由。你们那儿不是自由，而是为所欲为：强者掠夺弱者，可以剥夺弱者的财产和生命。按照你们的法律去寻求公正的裁判是很费时间的，案件一拖就是几年。有的人甚至一无所获。与此相反，我们这里就是最显要的大贵族也无权凌辱最低微的普通老百姓：沙皇只要接到控告，便立即组织法庭，进行处理。如果国王的行为不公正，而他的权力却是：像上帝那样秉公惩罚或宽恕。我们与其忍受自己同胞的凌辱，不如忍受沙皇的凌辱，因为他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俄罗斯人确实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堪与他们的沙皇相提并论，人们到处都称他们的沙皇是：“公正的太阳，照耀着俄国”^②。莫斯科人关于他们的不自由优于波兰——立陶宛的自由的意见表明，在动乱高涨时，大俄罗斯的居民在臣民对最高当局的态度问题上仍然保持着在伊凡雷帝末期形成的观点。“好沙皇”的观念使俄国民众即使在“暴君”的时代，也从来只反抗“沙皇的臣仆”而不反对沙皇，这些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滞后。

普列汉诺夫指出，大动乱是一场悲剧。这悲剧在于人民囿于当时的条件，各阶层的不满虽然“极大地动摇了莫斯科的社会政治制度，却没有客观的可能用某种新的、对他们少些麻烦的制度来代替这一制度”。这种“客观的可能”，在主观上表现为参加骚动的人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社会政治要求。这是一种没有出路的悲剧。当宦官阶级，商人以及部分北部农民不能忍受“立陶宛人”和俄国“盗贼”的暴行，实行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们所恢复的——而且必然要恢复的——是旧的秩序，即由于对其不满而引起混乱的那种秩序^③。梁赞诺夫斯基也指出，“不管从1598年到1613年发生了什么，本质上说专制制度没有受到损害。事实上，当一切的一切结束之后，专制制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显得是唯

①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的政治思想》，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② [俄] 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第193～194页。

③ 同上，第234～235页。

一合理的政府形式，也似乎是唯一能够确保和平和安全的制度”。建立在中央集权和服役贵族基础上的莫斯科专制制度度过了大动乱的危机和挑战，在17世纪继续得到发展，如其在16世纪一样^①。

可以说，政治精英的软弱和社会政治意识的滞后正是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流产”的重要原因。当代学者A. Г. 丹尼洛夫不无感叹地指出，大动乱的极端条件下不允许新幼芽（在选举的原则上形成中央政权，限制沙皇的个人权力）在俄国土地上生根。这些原则没有得到立法的巩固，要在俄国社会大部分人中形成新的意识，15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而后至今的400年里，俄罗斯人不止一次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俄罗斯人摆脱危机究竟应该用民主还是专制？”17世纪初俄国先辈们的选择是限制民主的萌芽，并不断强化专制君主制^②。

如何理解俄国历史存在等级代表君主制发展的可能却最终并未走上等级代表君主制发展道路的这种吊诡？也许恰如新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③所言，特定的历史事件可能影响最初的制度安排；已有的制度安排也并非处于均衡状态，而是受最初和随后发生的历史偶然事件的影响，朝着不同的方向和路径，持续变迁和演化^④。大动乱正是俄国历史的这种“偶然事件”，影响着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变迁，使俄国政治制度一度有了向“等级代表君主制”发展的趋向。但“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方式维系的制度可能表现出效率低下的情况”，“那些持续存在的制度安排并不一定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⑤。俄国专制君主制从伊凡三世开始持续存在到尼古拉二世时代，其制度本身的自我强化惯性，吞噬了大动乱等历史机遇所创造的可能，使俄国政治制度虽然并非一直沿着专制君主制的道路直线式发展，却在数个世纪的历史机遇中始终难以脱离专制君主制的范畴。

（责任编辑 李中海）

①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159页。

② Данилов А. Г. Новые явл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муты. С. 95.

③ 新制度主义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界开始的制度研究热潮而兴起的。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是继现代化理论之后的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视角。新制度主义通过对制度的生成、维系、变迁的考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发展的原因来自于制度变迁的需求；第二，政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均衡—不均衡—均衡的过程；第三，政治发展的类型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第四，落后国家政治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制度变迁存在着恶性的“路径依赖”现象。参看陈文新：《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④ 孙圣民：《制度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最新进展综述》，载《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2006年。

⑤ 马雪松：《政治世界的制度逻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